

国家、民众与佛教:西夏崇佛的历史心理探析

郝振宇

(陕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陕西 西安 710119)

摘要:从施印佛经发愿文、西夏佛教政策等方面探析西夏统治阶层和民众阶层崇佛的不同历史心理。分析认为,西夏崇佛的推动因素有二:一是上层统治贵族的政治性提倡,二是下层民众的生活化信仰;分析还认为,统治阶层和民众阶层崇佛的心理有异同:相同之处是作为自然人都有虔诚礼佛、解脱现世苦厄的个体性宗教愿望;不同之处在于统治群体愿望的政治意味较浓,着眼于统治范围的整体,而下层民众愿望的生活味道较重,集中于摆脱自身生存困境。分析结果表明,西夏佛教的兴盛源于西夏两个阶层不同心理诉求的共同推动。

关键词:西夏;国家;民众;佛教;发愿文;佛教政策

中图分类号:B949.2;K246.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6248(2014)03-0019-06

西夏是崇佛之国,上层统治群体和下层民众皆积极参与其中,佛教作为西夏重要的宗教信仰,受到全国的狂热崇奉。故有夏一代,佛教大行其道。史书记载:“至于释教,尤所崇奉。近自畿甸,远及荒要,山林溪谷,村落坊聚,佛宇遗址,只像片瓦,但仿佛有存者,无不必葺,况名迹显敞,古今不泯者乎?”^[1]在西夏境内,自兴庆府到边境村落,以至于山林溪谷,处处可见佛教存在的痕迹。只要与佛教有丝毫关联的“只像片瓦”更是“仿佛有存者,无不必葺”,客观上凸显出西夏崇佛之盛和国人的崇佛诚心。西夏崇佛何以如此之盛,其原因学界已有论述,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河西、陇右长期深厚的佛教信仰基础;第二,良好的外部信仰氛围,如宋、辽、金等国佛教信仰的熏陶;第三,统治者的崇奉提倡^[1-3]。但笔者认为西夏崇佛有更深层的解释,故不揣浅陋,拟推究西夏崇佛的心理轨迹,认为西夏佛教盛行的深层原因即在于统治者和民众不同的心理诉求之共同推动,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佛经发愿文反映西夏群体的崇佛目的性

西夏佛教盛行,有赖于上层统治者和下层民众的推动。两个群体对佛教都表现出一种强烈的虔诚,即使这种虔诚带有自身的阶层性。然而两者大相径庭的崇佛心理具化为相似的崇佛行为,二力合一,共同促进西夏佛教的蓬勃发展。下文以西夏部分汉文佛经发愿文为切入点,透过上层统治者和下层民众的祈愿来深入了解他们的崇佛心理,进而明了西夏佛教盛行的内质。

(一)西夏统治群体的崇佛目的性心理

西夏佛教大盛,有赖于统治者的积极提倡。佛教自汉末入华初始,基本上沿袭印度模式自主发展,但“不久即适应中国社会的特点,发生了性质的变化,从纯粹的宗教组织逐步演变为既有宗教性质,又

收稿日期:2014-03-07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0&ZD081)

作者简介:郝振宇(1988-),男,山东寿光人,历史学硕士研究生。

有政治和经济性质的社会组织。”^[4] 魏晋以降，中土佛教主导者认识到在当时社会环境下依附封建皇权生存的重要性，故而道安认为：“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5] 自此，开启了佛教与世俗政权互相依存之门，依附政权以传播发展佛教，成为佛教在华发展的便捷途径。而历代统治者也都自觉、不自觉地践行这一法则。西夏建国前后，统治者大力提倡佛教，佛教成为西夏最主要的宗教。“西夏统治者率先接受佛教，并推动它迅速发展，他们利用手中优越的政

治、经济条件，大力提倡佛教，希图借助佛门保佑皇权，并以佛教大力宣扬忍耐，来维护其封建统治。”^[6] 西夏统治者维护其封建统治的心理是推动佛教发展最重要的动力。因为统治者不会无理地抛弃本族信仰而支持另一种宗教，除非这种宗教比本族信仰更有利于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种谋取自身统治利益的心理在统治贵族施印佛经发愿文中得到一个侧面的诠释。

表 1^[1,7] 中所涉及到的西夏统治贵族有皇族（如

表 1 西夏统治群体发愿文概表

发愿者	经名	施经时间	发愿目的
李仁孝(仁宗)	《圣观自在大悲心总持动能依经录》并《圣相顶尊总持功能依经录》后续发愿文	1141	之子之孙，益昌益盛。基业泰定，迩遐扬和睦之风；国本隆昌，始终保清平之运，延宗社而克永，守历数以无疆。四方期奠枕之安，九有获覆盂之固。
李仁孝(仁宗)	《佛说圣佛母波若波罗蜜多心经》	1167	六庙祖宗，恒游极乐，万年社稷，永享太平，一德大臣，百祥咸萃。更均余祉，下逮含灵。
任得敬 ^①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1167	冀资冥祐，速愈沉痾。邦家巩固，历服延长。岁稔时丰，民安俗阜。
李仁孝(仁宗)	《佛说圣大乘三归依经》	1184	皇基永固，宝运弥昌，中宫永保于寿龄，圣嗣长增于福履。满朝臣庶，共沐慈光，四海存亡，俱蒙善利。
李仁孝(仁宗)	《佛说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	1189	历数无疆，宫闱有庆。不谷享黄发之寿，四海视生平之年。
罗氏 ^②	《佛说转女身经》	1195	龙图永霸，帝业长隆，皇女享千春之福，宗亲延万叶之祯。武职文臣，恒显荣于禄位；黎民士庶，克保庆于休祥。
罗氏	《大方广佛华严经普贤行愿品》	1196	梦图巩固，长临万国之尊；宝历弥新，永耀阎浮之境。文臣武职，等灵椿以坚贞，兆民贺尧天之庆，万姓享舜日之荣。
神宗	《金光明最胜王经》 ^③	1214	百谷成熟，□□□□□□□次，万物具不失性，

仁宗)、后族(如罗氏)、外戚(如任得敬)等,作为既得利益者,他们的愿望主要是“基业泰定”、“皇基永固”、“龙图永霸”、“帝统延昌”,表现了作为社会人尤其是统治阶级的根本心理。这些世俗愿望最能揭示当时西夏社会的整体状态。施印的这些发愿文集中于西夏中后期夏仁宗在位时,正值辽、金、宋三国更迭变化,北方金灭辽,江南宋朝偏居,天下格局发生重大变更,只有西夏对金“以事辽之礼称藩”,“自今以后,凡于岁时朝贺、贡进表章、使人往复等事,一切永依臣事辽国旧例”^[8]。西夏成为金国的附属国,取得暂时稳定。此时,漠北蒙古也在悄然崛起,慢慢地改变着天下三分的后三国格局。西夏中后期皇权更迭、崇文抑武,国力已不如前期。^④在自身力量无法维持统治现状或者扭转局面时,寄托于法力无边的佛教以幻想着“帝统延昌”也许是统治者的首要选择。佛教大行其道,成为统治者的逃避现实的避风港。此时统治者的心态已经与前期大不相同。前

① 任得敬是西夏中后期崇宗、仁宗的外戚。初为北宋西安州通判,夏元德八年(1126),崇宗进攻西安州,任得敬降夏,仁宗大庆元年(1140),西夏夏州统军叛乱,任得敬率军平叛,有功於西夏皇室,入朝参政,权势日盛,有分土裂国之想。仁宗乾顺元年被灭族。详情见吴广成《西夏书事》卷 35 第 403 ~ 408 页,卷 37 第 435 ~ 437 页,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 年;史金波《西夏“秦晋国王”考论》,发表于《宁夏社会科学》1987 年第 3 期第 72 ~ 76 页。

② 罗氏是西夏仁宗第二任皇后,本中原人,陷没于夏,仁宗天盛十九年(1167)封为皇后,乾祐二十四年(1193)夏仁宗尊其为皇太后,天庆十三年(1206),废桓宗立李安全为襄宗。罗氏是西夏后期具有实权的统治者。详见吴广成《西夏书事》卷 37 第 433 页,卷 39 第 464 页。

③ 此经原是西夏文,史金波译为汉文,转引自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 年。

④ 西祚初期,以武立国,尚武精神盛行。秉常主政以降,仰慕汉族文化,崇宗乾顺创立“国学”和“养贤务”,借鉴中原方式培养人才,崇文抑武之风大盛。西夏传统的尚武精神日渐衰落,军队战斗力渐降。日渐落后于宋朝,丧失战略主动权。西夏有识之士逐渐认识到这一潜在危险。御史大夫谋宁克任认为:“吾朝立国西陲,射猎为务。今国中养贤重学,兵政日弛。……愿主上既隆文治,尤修武备,毋徒慕好士之虚名,而忘御边之实务也。”见吴广成《西夏书事》卷 32 第 371 页。

期统治者把佛教作为辅助工具:“通过宗教的影响就能从被统治阶级内心深处建立起迫使他们驯服的震慑力量,大大有利于巩固他们进行压迫和剥削。”或者是:“统治者大力提倡佛教。……以垄断着人们灵魂能否进入所谓‘净土’或‘极乐世界’的神权做幌子,来进行欺骗麻醉,实现光靠赤裸裸的镇压所难达到的统治目的。”^[9]后期统治者则把佛教作为国家的精神寄托,在军事力量虚弱时大肆崇佛祈祷以求获得神助拯救国家。

(二)西夏下层民众崇佛的目的性心理

人类自有意识思维起,迫于强大的自然力,受制于自身力量的弱小,在潜意识中就有一种对超自身力量的崇拜与信仰,通过一系列复杂的仪式祈祷以达到自身设想的目标。所以产生了自然崇拜、祖先崇拜、英雄崇拜和宗教信仰,虽然崇拜或信仰的外在表现对象不断发生变化,但其自身信仰的内在本质却始终不变,其本质终究是通过某种超自身的力量来达到自己预想的目标。对经济和文化水平相对低下的西夏下层民众而言,其内在信仰的本质不变,只是信仰对象更为与当时社会进步密切。

党项民族经历了从氏族部落到封建社会的急遽变化。其信仰也从原始的自然崇拜几乎一步跨越到高层次的宗教信仰,当然这种明显的变化主要是在上层的统治阶层,他们不仅掌握了政治、军事、经济机器,文化机器也被他们垄断。所以佛教成为上层阶层推行思想霸权的重要工具。统一的国家政权绝对不允许非我族类的英雄崇拜的出现,即使是原来统治者也信仰的自然崇拜或者祖先崇拜,这一切必须收归于统治者掌控的佛教之内。因为“在佛教信仰之前,党项人崇奉鬼神和自然物,巫术十分流行。建立政权后,原始低级的信仰难以发挥作用”^[9]。所以在宗教信仰方面,西夏统治者是当之无愧的“历史人格者”,“此等人实为主动——最少亦一部分的主动——而其人面影之扩大,几于掩覆其社会也。文化愈低度,则历史人格者之位置愈为少数所垄断,愈进化则其数量愈扩大”^[10]。就西夏佛教的兴盛而言,首要在于统治者的大力提倡,继而以种种行政或经济手段给群众施加高压或诱惑的影响,次要在于河西地自汉魏两晋南北朝就是佛教传入中国的必经之地,其佛教必然对当地民众有一定的影响。在当时此地的民众心里,佛教是有一定根基的信仰。两者结合,共同促进西夏佛教大盛。西夏统治者为首出的人格者,随着文化兴盛,这一团体逐渐扩大,渐

次及整个社会,从而在全国形成对佛教的狂热。

西夏民众在现实的生活中,必定要受到统治者的压榨。西夏作为一个经济不发达的半游牧国家,国家的生产能力本身就受到自然环境的极大制约,其对外贸易也缺少大宗交换的物品,相较于统治贵族而言,下层民众的生产和生活应该处于一个更低水平。《隆平集·赵保吉传》载:“西北少五谷,军兴,粮馈止于大麦、草豆、青麻子之类。其民则春食鼓子蔓、咸蓬子,夏食苁蓉苗、小茺莢,秋食席鸡子、地黄叶,冬食沙葱、野韭、拒霜、白葛,以为岁计”^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夏普通民众的生活状况。西夏民众一般从事两种职业:一是畜牧业,二是种植业。畜牧业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存在,而种植业则集中于宁夏平原、河套平原和河西走廊有冰雪融水灌溉的地方。就全国范围的经济水平而言,西夏的经济发展受自然环境影响较大,故经济水平相对于同时代的宋、辽、金等国较低。下层民众的生活更是相对低下。高压的统治政策、较低的生活条件交织在一起,加剧了民众的生活困苦,所以以度人为任务的佛教在西夏境内具有了一定的发展基础。西夏民众的佛经发愿文也较多地关注个体及亲属的后世,于国家方面鲜有触及,现存文献资料有关这方面的内容较少,如表2所示。

从表2可知,西夏民众发愿文主要体现的是宗教愿望,主要有两点内容:一是祈祷考妣离苦得乐,往生净土,是对死者的祈福;二是对生者的祈祷,罪孽令灭,生活安生。“一般来说,文化水平相对低下的普通百姓对于佛教抱有更朴素、更真挚的信仰,而这种信仰又多与艰深繁琐的佛教义理无涉,并且多是与道教和传统民间信仰相互关联,更多体现本土的伦理、教化色彩和实际的功利目的。……民众的精神状态与实践活动乃是推动佛教发展的强大动力。”^[11]西夏民众的佛教信仰相对单纯性,他们的世俗愿望和宗教愿望具有终结的相似性。可以说,他们的世俗生活是在宗教信仰的指导下铺就的。与统治者的世俗信仰不同,民众是在受统治者意志支配下的法律范围内进行有限的活动,所以西夏民众的世俗信仰也是在相应的生活基础上的有限想象。他们接受的佛教不是政治色彩浓郁的宫廷和贵族佛教,也不是闲适超俗的山林佛教,他们接受、奉行的

① 曾巩《隆平集》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辽史·西夏外记》亦有类似记载,西夏“土产大麦、草豆、青稞、鼓子蔓、苁蓉苗、小茺莢、席鸡草子、地黄叶、登廂草、沙葱、野韭、白蒿”。

表 2 西夏民众发愿文概表

发愿者	经名	施经时间	发愿目的
陆文政	《大般若波罗密多经》	1073	佛钟不断,善业长流。荐资考妣,离苦得乐,随弥勒以当来,愿值龙华而相见,然后福霭沙界,利及□□,有识之俦,皆蒙此益。
仇彦忠	《圣六字增寿大明陀罗尼经》	1200	亡灵父母及法界有情,同往净方。
陈慧高	《金光明最胜王经》	1247	罪孽令灭,三恶八灾苦报莫受。欲现最安生,渐成佛道也。

是庶民佛教,而且这种庶民佛教还和西夏的原生宗教并行不悖。西夏的巫术崇拜在下层民众中一直盛行,佛教在一定程度上只是巫术崇拜的一个补充,民众信仰的庶民佛教简单易行,尤其是隋唐以来盛行的净土信仰和观音信仰,更是具备简单的仪式而被西夏民众所接受,成为辅助原生宗教的重要手段。

二、世俗社会中崇佛拉推力的契合

汉末佛教入华,魏晋南北朝时逐渐与世俗政权相依存,到隋唐成为封建国家统治的一部分,佛教在中土找到了其生根发展的土壤。佛教“从根本说并没有构成与现世政治相对抗的一面,它的超越的追求主要体现在观念和礼仪上,而不是在实际社会活动和最终目的上。这也是它终归得到世俗统治者普遍的容认,加护或崇信的重要原因”^[11]。自佛教逐渐在中土被民众普遍接受并信仰,统治者利用佛教来掌控和引导民众思想,使佛教成为统治者维护政权的一件利器。西夏崇佛,在民众信仰基础上,统治者对佛教进行政治规范和经济优待,恩威并施借此诱导民众向统治者推行的佛教政策靠拢,以达到掌控全民、巩固政权的目的。

(一) 僧尼的政治、经济优待

代表封建政体内行政官僚体系的从来是国家范围内的少数人,僧官体系亦如此。虽然佛教经汉魏至隋唐已经逐渐成为中国文化和民众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且僧侣遍及城乡各地,但作为宗教界的科举制度,僧官选拔制度成为民众跻身僧侣的唯一合法途径,从而保证了僧侣在政治上对朝廷的绝对服从。而僧官选拔制度也成为评判民众与僧尼、僧团等级的绝对标准,相应的某些优待政策就限定在僧侣内,僧团也就具有一定的身份区别性,西夏政权借鉴前朝制度,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对僧人给予优待。

第一,以官品抵罪。西夏僧尼的政治优待主要是依官品高低进行不同等级的罪罚减轻政策,即依据绯、紫、黄、黑等服色所代表的职位高低,分别给予相应的减罪优待。^①以衣服服色来代表官职高低始于唐代,其时佛教已成为中国民众社会生活的重要

组成部分,僧官是国家在佛教中存在的重要体现,所以世俗政权中用以区分职位的服色制度也适用于宗教界。西夏律法借鉴《唐律疏议》,其中很多法律条文与《唐律疏议》有继承关系。官品抵罪的政策明确地彰显了佛教在西夏的地位,普通民众要想拥有如僧尼般的优待,必须诚心从佛向善,遵从统治者的既定政策。

“僧人、道士中赐穿黄、黑、绯、紫等人犯罪时,除十恶及杂,罪中不论官者以外,犯各种杂罪时与官品当,并按应减数减罪。”^[12]

“僧人、道士中赐黄、黑、绯、紫者犯罪时,比庶人罪当减一等。除此以外,获徒一年罪时,赐绯、紫当革职,取消绯、紫,其中依法按有位高低、律令、官品,革不革职以外,若为重罪已减轻,若革职位等后,赐黄、黑徒五年,赐绯、紫及赐绯紫职位相等徒六年者,当除僧人、道士,所遣劳役有官与官品当,无官,则依法服劳役。日毕后,入原属庙中为行童。”^[12]

“和尚、道士衣绯、紫、黄、黑等高低殴伤杀时,执职位及实有官者,可以职位,官品当。无官,则衣绯、紫,依殴伤杀有自暗监至戏监官人法,衣黄、黑依殴伤杀有自十乘至胜监官人法判断。”^[12]

第二,经济优待。西夏僧官可以享受官府提供的种种经济优待,最重要的就是可以不纳或者少纳租税,他们构成了西夏社会中以宣扬佛教为主、不劳而获的特殊阶层。西夏崇佛,不仅修缮寺庙,寺庙修缮完后,国家还会施舍大量财物,以为庆赞。凉州护国寺重修竣工时,官府给护国寺“特赐黄金十五两,白金五十两,衣着罗帛六十段,罗锦杂幡七十对,钱一千缗,用为佛常住。又赐钱千缗,谷千斛,官作四户,充番汉常住,俾晨昏昏火者有所资焉,二时斋粥者有所取焉。至如殿宇廊庑,僧房禅窟,支颓补□,□一物之用者,无不仰给焉,故所需不匮”^[1]。其后,

① 赐紫、赐绯是唐代官制中一种服饰制度,以职官的服色表示职位高低,三品以上紫色,五品以上绯色,后来这一制度用于宗教界。西夏对此继承发展,增加了黄、黑两色。

施印佛经时:“作广大供养,放千种施食,放生命,喂囚徒,饭僧设贫,印造经卷彩画,数串等普施臣吏僧民。”^[1]官府给僧尼的优待对普通民众有极大的吸引力,因为西夏的可耕用地集中在河套平原、宁夏平原、河西走廊绿洲,全国范围内农业生产比较落后,西夏不间断地与周边国家,尤其是北宋进行战争,民众承担着沉重的兵役、赋税和劳役。相比之下,僧侣没有兵役,赋税和劳役也极少,所以民众觊觎僧侣优待,目的性极强地崇佛,有利于政权巩固,还积淀了更深厚的崇佛基础。

(二) 官府对僧尼的制度约束

西夏虽人口偏少,但僧侣众多,曾有一次性度僧三千人的记载。为确保对僧侣的有效控制和防止僧侣过多对国家造成的不必要危害。西夏政权借鉴中原王朝经验,制定相应的法律,环环相扣,形成了一系列控制措施。其主要的措施是试经制度和度牒制度。

(1)约始于南齐检试僧、至唐宋完善的试经制度,是官方对僧侣的约束制度之一。此制度把判别僧人资格的标准和权力收归于官府。要取得僧人资格必须通过官府设定的考试,官府由此掌握了民众通向僧侣的途径。继唐之后,与宋同时代的西夏继承试经制度,在法律中有明确的规定:“番、汉、羌行童中有能晓颂经全部,则量其业行者,中书大人,承旨中当遣一二口,令如下诵经十一种,使依法诵之。量其行业,能诵之无障碍,则可奏为出家僧人。”^[12]“番羌所诵经颂:《仁王护国经》、《文殊真实名》、《普贤行愿品》、《三十五佛》、《圣佛母》、《守护国吉祥颂》、《观世音普门品》、《竭陀般若》、《佛顶尊胜总持》、《无垢净光》、《金刚般若与诵全》。”^[12]“汉之所诵经颂:《仁王护国》、《普贤行愿品》、《三十五佛》、《守护国吉祥颂》、《佛顶尊胜总持》、《圣佛母》、《大方广》、《观世音普门品》、《孔雀经》、《广大行愿颂》、《释迦讚》。”^[12]西夏的试经制度针对境内的番汉民族,两者都有规定的诵经要求,要满足一定的硬性条件,无论番、汉、羌等族别的行童必须要依赖自身通过诵背律法规定的经文考核,经考核合格才能成为僧。他们所诵背的经文是统治者依据自身需要制定的,主要是与国家兴旺、社会安定等有关。

另外,除了法律强制性的试经制度,还有一种较温和的政策,针对无家室的倾心向佛的寡妇和未嫁女:“诸寡妇、未嫁女等有诚心为佛法,异议无有而为僧人者……依所欲住家或出家为僧人……自中等司承旨、中书、枢密……以上人之母亲、妻子等衣绯,

此外以下者衣黄。”^[12]可见,寡妇和未嫁女则没有硬性的规定,依所欲而为,而且依据个人。儿子或丈夫的官职还有一定的优待。

(2)始于北魏灵太后,唐初完全确立,其后各代相袭的官度是政府干涉佛教事务的又一措施。“唐代,度僧制度更加完善,出家不再是简单的个人自愿行为与寺院接纳的宗教内部事务,而是把批准的权限掌握在政府手里。由政府发放度牒,作为身份依据。”^[11]有无度牒成为是否“入道”的分界线,由于僧人在一定程度上享有国家提供的优待,所以对度牒的有效管理体现着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特征。西夏律法明确规定“不许无牒而为尼僧”^[12],只有经过官府承认才具有合法身份。另外,还不允许“彼之父、伯父、子、兄弟、孙诸亲戚同姓名等涂改字迹,变为他人出家牒而为僧人、道士”^[12]。“国境内僧人、道士中虽有官,儿子、兄弟日求袭出家牒等时,不许取状使袭之。”^[12]度牒仅为自己所有,不允许外借和世袭,僧尼死后度牒还官或注销,防止“僧人、道士之实才以外诸人”、“诸人及丁”、“使军”成为伪僧人。严格限制了西夏僧人的数量,把佛教铨选的权力牢牢地掌握在统治者手里,防止非法成僧之徒逃避税务,有效保证僧侣的政治和经济优待。

(三) 既定环境中民众的崇佛推力

西夏政权施行的佛教政策加强对佛教事务的全面深入管理,优待和严惩并行不悖,其对象是具有合法身份的僧侣阶层。对于民众而言,对施行的佛教政策有深层次考量,即把握政策的优惠,趋避从严惩罚,其结果自然是民众依据统治者制定的僧官选拔制度成为合法僧侣,进而趋利避害、目的性极强地拥护所定政策。实际上,统治者通过对僧侣的有效控制而给佛教施以枷锁,但是民众在绝大程度上可以接受实行。就西夏全国一般民众而言,所谓的佛教信仰就是适应本土生活习俗的庶民佛教,仪式简化,教理易懂,更大程度上是心灵的麻醉剂。他们不具有僧侣的合法身份,不受僧官体系约束,服从世俗法律。民众安于现状的态度奠定了底层民众崇佛的深厚根基。

部分民众或具学识,或有进心,承袭“学而优则仕”的理念跻身僧官队伍,成为合法僧尼,在遵从律法的前提下,享有部分优待,即官品抵罪和经济优惠。僧官队伍虽然服从于政治,但是僧官内部政治性不强,他们看重的是僧官体制附带的优惠。因西夏战乱频仍,农业经济欠缺,普通民众承担兵役、劳役、赋税等,生活压力极大,僧侣可免除部分赋役,减

轻自身压力,加之有政府对僧侣扶持,所以民众对佛教具有趋从心理,上层统治者和下层民众以佛教为纽带,建立了一种相互作用的关系,从而共同推进了西夏佛教的盛行。

三、结 语

综上所述,西夏立国的河西地区从汉末以降就一直是佛教的传播重镇,大乘、小乘相互交融,佛教在此有数百年的积淀。民众已是佛教的追随者和受益者。西夏作为后来的统治者,要想有效地进行统治,必须要适应当地民众的信仰需求,否则一味依赖强权无法保证统治巩固。西夏统治者实现政治统一的必要手段就是营造文化认同,佛教无疑是联系社会群体的最佳纽带。“文化的整合乃是实现政治统一的必要条件。历史上形成的统一的意识形态,统一的文化传统乃是凝聚民心,巩固统一国家,消弭内部各种矛盾的重要因素。……宗教主要作用于人们的精神层面。它一方面能够深入影响到社会上更广泛阶层,包括上层统治者到底底层的群众,甚至国家政令难以到达的地方。另一方面信仰又能够有力地调动起人们的主动精神,发挥出政治强力所起不到的作用。”^[11]西夏统治者立足实际,扶持佛教,民众对相关政策的利弊也有自身的衡量标准,民众崇佛

就在于看到其中的利大于弊。统治者和民众的心理正好形成一种齿轮性的互补,两者互惠互利,共同促进了与他们命运息息相关的佛教在西夏的发展与繁荣。

参考文献:

- [1] 史金波. 西夏佛教史略[M].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 1988.
- [2] 张超. 佛教在西夏传播的社会历史条件[D]. 长春:东北师范大学, 2009.
- [3] 崔红芬. 西夏河西佛教研究[M]. 北京:民族出版社, 2010.
- [4] 谢重光, 白文固. 中国僧官制度史[M]. 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 1990.
- [5] 慧皎. 高僧传合集[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1.
- [6] 史金波. 西夏社会[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 [7] 范立君. 俄藏黑水城发愿文研究[D]. 兰州:兰州大学, 2011.
- [8] 脱脱. 金史[M]. 北京:中华书局, 1975.
- [9] 吴天墀. 西夏史稿[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 [10] 梁启超. 中国历史研究法[M]. 北京:中华书局, 2009.
- [11] 孙昌武. 中国佛教文化史[M]. 北京:中华书局, 2010.
- [12] 佚名. 天盛改旧新定律令[M]. 史金波, 聂鸿音, 白滨, 译注. 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0.

Nation, masses and Buddhism: historical psychological construction of Buddha worship during Xixia dynasty

HAO Zhen-yu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119, Shaanxi,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different historical psychologies of Buddha worship between the ruling class and the masses in the respect of printed Buddhist scriptures, vow texts and Xixia Buddhism policy. According to the analysis, there are two main factors which promote the Buddha worship: political advocate from the upper ruling class and faith in life of the masses from the lower class. It also reveals that there are som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above two classes in their subjective psychologies. Their common aspect lies in that as natural persons, they all have the religious wish to remove the suffering in their lives by paying respect to Buddha piously. Their difference lies in that there is strong political intention for the ruling class, with overall ruling scope as its focus; while there is a strong taste of life for the masses from the lower class, with getting rid of their existence dilemma as their focus. The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rise of Buddhism has been stimulated by the different psychological demands of two different classes in Xixia dynasty.

Key words: Xixia dynasty; nation; mass; Buddhism; vow text; Buddhist policy